

传播符号学研究专辑 ● ● ● ● ●

结构与互动：时尚符号学研究的两条路径

廖茹菡

摘要：时尚的表意功能使它进入了符号学的研究视野。现代符号学主要有两套理论体系，时尚的符号学研究也由此走向了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跟随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传统，结构主义的时尚研究关注脱离现实事物的意义体系，以整体性的静态视角把握时尚的意义构建。受益于皮尔斯符号学的符号互动理论则以动态的视角分析时尚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的生成过程。前者具有整体的把控能力但脱离了现实，后者贴合了现实却相对地忽略了具体的时尚符号。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更全面地分析各种时尚事件。

关键词：时尚，结构主义，符号互动，符号学，指号学

Structuralism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 Two Approaches to Semiotic Research on Fashion

Liao Ruhan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fashion makes it an object of semiotic research. The two main theoretical systems of modern semiology lead semiotic research on fashio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Structuralism, in the Saussurean tradition of semiology, addresses the meaning system of fashion both statically and collectively;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influenced by Peirce's theory of semiotics, concern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generating fashion through interac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The former can be holistically applied but is isolated from reality,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reality but ignores the meanings of specific fashion symbols. Therefore, the only way to analyse fashion comprehensively is to combine these two methods.

Keywords: fashion, structuralism, symbolic interaction, semiology, semiotics

DOI: 10.13760/b.cnki.sam.201702012

时尚,尤其是时装具有表意的能力,已是一个共识。“‘我们的穿着是一种陈述’,这个陈述本身在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时代中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Davis, 1992, p. 5)不少学者都发表了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述。艾柯说,“我通过我的衣服说话”(Eco, 2007, p. 144);卢里认为,服装是“一种比语言更古老和更世界性的语言”(2000, p. 1);巴纳德指出,人们总是相信不同的时装蕴含着不同的意义,或者能传达不同的信息,这是人们选择时装时的标准(Barnard, 2010, p. 25)。

正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的一切交流活动都是通过使用符号实现的。因此,时尚的意义表达功能必然使得时尚成为符号学的分析对象。西方现代符号学主要有两套体系,一个是源于索绪尔的符号学(Semiology),一个是源于皮尔斯的符号学(Semiotics,又译“指号学”)。沿着这两条不同的路径,时尚的符号学分析也形成了两种研究方式,即以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以布鲁默为开端的符号互动论。

一、结构主义的时尚研究

罗兰·巴尔特是结构主义时尚研究的开创性人物及典型代表。巴尔特的时尚研究持续了近十年的时间,而他的研究对象也在这期间发生过转移。他原本将研究对象设定为真实的服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构建超出传统语言的符号理论。然而,在研究的过程中,巴尔特发现真实的服饰是一个连续体,从中并不能明确地分离出能指所需要的不连续的单元,同时,服饰的所指也没有客观的确定性。由此,不论从能指还是从所指看,真实的服饰都是一个极其模糊的对象。面对这样的境遇,巴尔特只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书写的服装之中,因为“只有书写服装没有实际的或审美的功能,它完全是针对一种意指作用而构建起来的”(巴特, 2011, p. 7),它能为结构主义式的时

尚研究提供清晰且稳定的对象。正是这一转移研究对象的抉择拉开了结构主义时尚研究的序幕。巴尔特通过研究时尚而建构了一套符号学的文化研究体系。他对书写的时尚符号进行了详细的切割和整理,从构成能指的对象物、支撑物和各种变项,到所指当中的语义单元和组合,以及能指、所指和符号的修辞系统,都得到了全面的解读。

选择书写的服装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巴特能以一种共时性的方式对时尚进行探究,因为书写的服装不再具有真实服装的短暂性,这也构成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前提。巴尔特的这种研究方式是一种“原创性的举动”(史文德森,2010,p.64)。因为在此之前,时尚的研究大多是历时性的,它们关注的是时尚的诞生、变迁和发展。而巴尔特却将这种纵向的时尚溯源转换为了横向的相互关系分析,将历时性的时尚凝结为了一个静态的意义平面。不过,这种原创性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取消了时尚的本质,即暂存性”(p.64)。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共时性的研究虽然忽视了时尚的历史变迁,却关注了时尚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被去历时性的过程,也即是被神话化的过程。“神话是由事件的历史特质损失所组成”(巴特,1999,pp.202-203),它的根本原则就是“将历史转化为自然”(p.189)。而对这一神话化过程的揭示恰好就是一种去神话化,它剥去了时尚的自然伪装。没有了伪装,时尚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流行毫无内容,除非是在修辞层面。”(巴特,2010,p.261)巴尔特就这样以划分修辞结构的方式实现了对时尚的祛魅。

列斐伏尔延续了巴尔特的神话学观点,认为当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符号拜物教。不过,与巴尔特将重点放在分析自我指涉的符号体系之上不同,列斐伏尔继续停留在日常生活之中,并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瓦解符号的暴政。虽然在对待语言系统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但列斐伏尔与巴尔特在对待时尚的态度上基本一致。列斐伏尔指出,语言一旦脱离日常生活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就会陷入虚假意义的漩涡。时尚就是这样的一个虚假的意义体系,它“能够利用任何东西,包括虚构的和假装的适应;任何东西、或几乎一切东西都可以被谈及”(Lefebvre,1972,p.119)。这种观点既是对巴尔特的时尚分析的一种肯定和扩展,也是对时尚本身的一种谴责。在列斐伏尔看来,巴尔特的时尚分析虽然过分强调对主体的消解,忽视了真实的身体与服装,但却揭露了时尚体系的暴力专制。时尚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存在的首要条件之一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社会”。时尚是恐怖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部分,它“通过排除日常生活而统治着日常生活”,从而引发一种特定的恐怖。“时尚或者不时尚成为了哈姆雷特式问题的现代版本。”(p.166)

巴尔特的这种时尚论点也延续到了鲍德里亚。鲍德里亚简化了列斐伏尔的“消费引导型科层制社会”，而直接使用“消费社会”这个概念。他指出，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经久不衰的是物，而在今天，“看到物的生产、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鲍德里亚，2014，p. 2）“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2014，p. 1），这就是消费社会的境况，“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逻辑”（2014，p. 40）。消费由此成为一种语言的同等物，成为意义网络中的一种交流活动。这种交流活动使物不可避免地“扮演着社会地位的体现者的角色”（2009，p. 27），物的符号价值取代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人的阶层地位已突破了凝固性，因此，物也必须具有彰显这种“潜在的可变性”的能力。而使物具有这种能力的逻辑体系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时尚。“时尚形式的逻辑将一种持续的变动加诸所有的区分性社会符号之上。”（p. 28）

鲍德里亚同列斐伏尔一样，认为“在时尚的召唤下，所有的物都可以进入其中”（2009，p. 28）。时尚由此冲破了巴尔特研究中的服装屏障，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但不同于列斐伏尔的是，鲍德里亚并不认为时尚是一种恐怖主义，而是将其视为现代性的逻辑，即一种符号/价值的逻辑、差异性的逻辑、地位的逻辑和消费社会的逻辑（2009，p. 47），它任意且持续地进行着意义的生产。而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更是将时尚置于现代性逻辑的最高地位，成为一种仙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形式”（波德里亚，2012，p. 116）。现代性在设置一种线性时间的同时也设置了一种循环时间，前者是进步、生产和历史的时间，后者则是时尚的时间。时尚就是一种循环，它依赖形式的反复，“修理着‘曾经存在’的东西”（2012，p. 117）。

同时，鲍德里亚也强调时尚的任意性。时尚没有任何参照物，它就是当下的再生产，它“迫使我们接受一种想像秩序的深层断裂：即各种形式的参照理性的断裂”（2012，p. 116）。此外，时尚还具有颠覆性。它超越了理性与非理性、美与丑、有用与无用的界限，它“概括了经济抽象制度所查禁的一切”（2012，p. 125）。然而，时尚本身却是不可颠覆的，因为现代社会中并不存在与它相矛盾的参照体系，没有对立，便没有颠覆的前提。而作为现代性的逻辑，时尚更是不可逃避的。“尽管人们总可以逃离内容的现实原则，但人们永远不能逃离代码的现实原则。”（2012，p. 134）鲍德里亚一方面继承了列斐伏尔与巴尔特的时尚理论，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在列斐伏尔看来应该予以解除的时尚暴政在鲍德里亚这里变成了现代性不可逃离的逻辑方式。同时，鲍德里亚又打破了巴尔特的书写符号的限制，将一个封闭的时尚

意义体系与政治经济联系在了一起。

从罗兰·巴尔特到鲍德里亚，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将时尚视为一个由符号组成的意义体系，关注的是时尚体系内部的运作方式，而不是人们对时尚的认知过程。他们强调时尚符号的任意性，认为时尚的意义产生与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就像鲍德里亚所说，“不管是长裙还是迷你短裙自身都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是作为一种意义的衡量标准，在它们的差异性关联之中产生出来”（2009，p. 63）。结构主义以一种脱离现实的视角将真实世界的时尚掏空，时尚成了仿真的超现实。它站在时尚体系之外，以俯视的角度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时尚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其最大优点就在于避免了将时尚限定于某一行为或物质领域之中。但是，在解读具体的时尚行为或现象时，这种方式就会显得不够细致，不能详细解释时尚具象化后的模糊性和复杂性。符号互动理论在此就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

二、符号互动理论的时尚研究

时尚虽然具有表意功能，但它并不能传递明确的信息。服饰在前现代时期的社会身份指示功能在现代性的时尚中被弱化了。早在近百年前，萨丕尔就提出，理解时尚的主要难点就在于我们对形式、色彩、质地等时尚元素的无意识性的符号含义缺乏确切的了解。同时，时尚元素的符号意义会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这更增加了理解时尚的难度。（Sapir, 2007, p. 42）艾柯也指出，我们虽然能够通过服饰说话，但时装符号不如语言符号那般清晰，并且，它比语言符号更受制于历史变迁。（Eco, 2007, p. 144）坎贝尔认为，时装的持续性的表意能力并不是在传达清晰的信息。（Campbell, 2007, p. 164）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巴纳德的赞同。巴纳德指出，“时尚陈述不同于语言陈述”，时尚并不以“听者/说者”的模式表达意义。它是一种含蓄意指，不像直接意指那样具有明确的对与错。（Barnard, 2010, pp. 25-26）可见，现代时尚表意的模糊性同时尚具有表意功能一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现代时尚的模糊性具有两方面的成因。首先，物质水平的提高增加了时尚符号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在时尚超市中进行自由选购和搭配，时尚文化“从持续的一夫一妻制转向了持续的一夫多妻制”（Kaiser, et al., 1991, p. 167）。这使得时尚体系的符号结构不再能被清晰和固定地构建出来。其次，后现代思想也为时尚带来了不确定性。后现代“充满了力图瓦解（分解、解构、切断连接性）和力图整合事物的两种意志之间的空间”（哈桑，2015，p. 140）。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时尚的意义也呈现出解构与重组的循环，它只

能在多方的相互交流过程中才能被有限地识别。互动的多方不仅包含时尚内部的参与者与观看者，同时也包含作为时尚事件背景的文化环境。时尚就是“一种多面的现象，它将个体与社会环境和文化事件以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Kaiser, et al., 1996, p. 61）。而符号互动理论就是试图解读真实时尚的这些特点的一种研究方式。

布鲁默的集体选择论是这一研究方向的开端。他一方面以宏观的视角提出时尚是“现代社会中建立社会秩序的中心机制”（Blumer, 1969, p. 290），一方面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时尚的产生过程。布鲁默认为，时尚形成于人们大量的自由选择的过程之中。通过大量的集体选择，时尚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它不仅体现着文化变迁，还紧随现代性的步伐，时刻呈现着时代精神。因此可以说，时尚就产生于个人在与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互动中作出的种种决定。布鲁默虽然没有在其时尚研究中直接提及符号互动理论，但作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之一，他的时尚论述明显受到了这种理论的影响。布鲁默为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三个本质原则：首先，“人们是根据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所富有的意义而针对这些事物进行活动的”；第二，“这些事物的意义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产生出来的”；第三，“在这个人与他所遇到的事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他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过程而驾驭并修正这些事物的意义”。（2005, p. 634）布鲁默将时尚视为现代性的中心机制，这说明时尚并非是无意义的事物，这符合符号互动论的第一条原则。而时尚的意义产生于群体的集体选择，即一种社会互动，这符合符号互动论的第二条原则。同时，人们对时尚的选择会随时间的流动而发生改变，这是符号互动论的第三条原则的体现。

不过，有一种观点将布鲁默的时尚理论归入非符号的领域。这种观点指出，由于布鲁默将时尚置于非理性的维度，并认为它产生于一种不能解释的互动过程之中，因此，时尚在布鲁默的理论中属于非符号互动的层次。（汤喜燕，2012）然而，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并不足以将布鲁默的时尚理论排除在符号互动论之外。首先，布鲁默的符号互动理论本身就包含了非符号互动的层次。（布鲁默，2005, p. 640）其次，布鲁默将非符号互动定义为只对另一行动作出反应而不作出解释的行为（2005, pp. 640—641），但构成时尚的选择行为并不是类似于本能的无解释反应，它包含了将被选择事物理解为时尚的解释过程。第三，布鲁默虽然承认时尚中具有非理性的维度，但同

时也指出时尚并不是疯狂的情感互动。^① (Blumer, 1969, p. 277) 他虽然认为我们对形成时尚的互动过程不甚了解 (1969, p. 287), 但并没否认这个过程存在着被解释的可能性 (1969, p. 280)。另外, 也还存在着不少将布鲁默的时尚理论归入符号互动层次的观点。(Davis, 1992; Kaiser et al., 1991; Vannini, 2007)^② 因此, 即使布鲁默的理论带有一丝神秘主义的色彩, 让时尚成了一个似乎“不可言说”的领域, 但他的时尚研究不可否认地属于符号学研究路径。时尚符号互动论的另一代表人物戴维斯也对布鲁默的理论给出了较高的评价, 认为它提供了一个关于时尚过程的无比清晰的鸟瞰视角。(Davis, 1991, p. 17)

如果说布鲁默的理论还相对宏观, 没能关注到具有独特性的个人时尚行为, 那么戴维斯的时尚研究就是对布鲁默理论的进一步细化。戴维斯认为, 时尚理论家大多都忽视了时尚的象征性内容, 结构主义者及功能主义者将时尚的符号价值视为某种本质结构的偶然附加物, 而符号互动论家则忽略了具体时尚事件及事物的符号意义。(1982, p. 112) 由此, 戴维斯指出, 布鲁默的分析虽然为时尚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但还只限于一个“程序式的框架”^③ (1992, p. 119)。为了补充布鲁默理论的不足, 戴维斯一方面继承布鲁默的理论思路, 一方面研究具体的时尚事件, 用符号互动理论的方法深入真实的时尚世界。

戴维斯用“含糊性”(ambiguity)一词总结了时尚符号的特点。时尚符号是一种低语义性的符号, 它是一种“初始的”(incipient)代码或者“准代码”(quasi-code)。(1992, p. 5) 时尚的意义并非预先存在于单个的时尚符号中, 一套服饰的含义也不是各个部分的意义的简单相加, 而是产生于符号的组合和置换的过程之中。以西服和跑鞋为例, 西服通常表示职业, 跑鞋代表跑步, 但同时穿着西服和跑鞋的人却不是以跑步为职业或者跑步去上班的人。这种穿着的特定含义与它出场时的具体情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天气、穿着者的心情、着装的目的等都是影响这一着装符号意义的因素。此外, 不同的人

① 布鲁默将情感视为非符号互动层次的典型事例。(Blumer, 1936, p. 516)

② 万尼尼(Vannini)认为“时尚……是符号转变(Semiotic Transformation)和集体行动的历史意涵(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Joint Action)的绝佳案例”(2007, p. 309)。根据他对符号转变的定义, 即“意义历时性地以不同方式被生产、交换、解读、使用的过程”(2007, p. 306), 时尚可以被视为符号互动论的典型事例, 因为符号互动理论所关注的也是符号意义在多方互动中的产生过程。此外, 戴维斯和凯撒(Kasier)等人也都将布鲁默作为时尚符号互动研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③ 这种批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有观点将布鲁默的时尚理论划入非符号领域的原因。但是, 在研究中忽视时尚符号的意义并不等于将时尚视为非符号。

对这一装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这更增加了达成意义共识的难度。在互动过程中，时尚的意义永远没有达成的时刻，只有永恒生产的过程，绝对的意义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极限。可见，时尚符号的“含糊性”并非一种孤立的特性，它产生于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含糊性”的基础上，戴维斯还总结了时尚符号的其他几个特点：严重的语境依赖性、高度的社会变异性、非解码性，以及快速的变化性。（1992，pp. 8，14）这几个特点共同建构了现代社会中的时尚。

从布鲁默的理论框架到戴维斯的实际运用，符号互动论走上了一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它一方面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互动，另一方面又以个体的视角分析真实时尚事件中的意义生成过程。符号互动理论从漂浮的意义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以一种参与者的平行视角讨论着时尚符号的含义。虽然不像结构主义那样具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整体性的把控能力，但在面对情况各异的现实时尚事件时，它却能更加灵活地贴合真实境况。现代时尚与人们的社会身份紧密相关，而社会身份是由各种文化价值所构成，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模糊性的生成过程，因此，作为身份指涉的时尚也具有和社会身份相类似的模糊性。个人社会身份的张力加深了时尚意义的模糊程度，时尚的变化性又促使了个人身份的意义变动，时尚的符号意义就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中不断浮现与流变。理解时尚不再是对符号的解码，而是对其在具体情境之中的解读，时尚交流更多地被理解为个性化的表现，而不是明确的表达。

三、两条路径的理论来源及差异分析

结构主义和符号互动论都将时尚视为现代性的中心机制，但却采用了静态与动态这两种不同的视角。而造成视角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继承了不同的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主要沿袭索绪尔的语言学传统，而符号互动理论更多地显现出皮尔斯符号学的影响。思想、概念只有借助符号才能表达出来，这是两种符号理论的共识。但在构建符号学时，索绪尔与皮尔斯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途径，索绪尔从语言学家的角度分析符号，皮尔斯则从逻辑学家的视角研究符号。前者关注的是各个符号之间的差异性关系，是共时性的；后者关心的是符号意指过程中的逻辑，是历时性的。这种基本视角的不同也使得他们的研究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二分法体系与三分法结构。

索绪尔将传统的历时性言语研究转变为了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研究。具有任意性的语言符号并不是为已存在的事物命名，而是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所

指,因而符号系统不是自然世界的反映,而是一个独立的意义体系。在索绪尔的影响下,巴尔特将言语与语言的区分对应到了时装中,书写时装在时尚信息的交流层面上是语言,在通信的水平上言语。摄影形式的时装则具有“半系统化”的性质,一方面它是时装界人士构建的一种语言结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固定性的言语再现。而在真实的时装层面,服装的样式或结构相当于语言,具体的衣着相当于言语。(巴尔特,2008,p.15)可见,对于研究语言的符号学来说,书写的时装最具研究的可操作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套语言结构,不需要再从众多的言语中去达成契约,也不具有“半系统化”的模糊性。巴尔特由此而回避了真实的服装,在纯粹的意义体系内分析关于时尚的话语。他将时尚置入“真空”(Wilson,2003,p.57),抽去了时尚的历史与物质功能,从而使时尚中无意义的变化显得自然。巴尔特的这一方式激发了一大批以时尚杂志为对象的时尚研究,列斐伏尔与鲍德里亚则为时尚消费的符号研究提供了思路,它们共同构成了时尚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的主体。

当然,也有学者作出过用语言学的方式分析真实时尚的尝试。卢里就采取了一种十分直白的解读方式,将不同的服装直接对应为不同的词汇和语法。^①这种研究给人一种模仿巴尔特的感觉,不同之处只是在于将书写服装替换为了真实服装。这一替换虽然看到了被巴尔特忽略的现实,但也正好证明了巴尔特逃避现实的合理性。卢里的分析太过于直率,其“整本书是基于服装与语言之间的松散类比”(史文德森,2010,p.63)。她的方法与其说是对时尚的解读,不如说是对时尚的限定,即对原本具有丰富含义的时尚事件进行剥削,只留下一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正是书写服装所做之事。因此,卢里的分析更像是在补充巴尔特的前期工作,即将研究领域从现实世界转向意义世界。^②可见,要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分析自然世界中的时尚的确会遇到很多问题,而将关注点放置于时尚的意义体系上,就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些问题。这是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时尚研究的必然结果。

但对现实的回避也使结构主义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作为意义系统的时尚必须以真实的服装为物质性的载体,没有这种现实化的中介,一

^① 卢里进行了一系列的类比,例如重视时尚的人拥有较多的表达词汇,穿着传统服饰的人只拥有数量有限的词汇;复古的服装相当于古字;便服类似于语言中的俚语;饰品起着形容词与副词的作用……

^②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卢里的分析中仍有很多值得肯定的观点。她在类比的过程中关注到了时尚的特性:时尚的言语是自发且持续的,它的意义依赖于环境,这使得服饰价值观变得异常复杂,同时时尚还“是一种自由言论,而且是自由世界的基本人权”。这些都是时尚不能被忽视的本质属性。

切意义就都变成了无意义，因为将一个时尚品牌的名称画在身体上，并不等于穿上了这个品牌的服饰。结构主义的方法只揭示了时尚神话的诞生过程，却没能将它还原为真实的时尚，没有考察这种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异。虽然“神话的功能是要掏空现实”（巴特，1999，p. 203），但这些被掏空的现实却是神话得以构建的基础。符号的绝对任意性在真实的时装中并不存在，因为时尚符号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服饰的实际功能的束缚。一套西服即使能在纯粹的意义层面意指运动，但当穿着者想要将运动的概念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时，这种符号结构也会因为真实服装对身体的束缚而崩塌。这也就是将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延续到真实世界时的问题。虽然时尚产业的生产者拥有随意创造时尚神话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必定会受到真实市场的制约。

相比之下，符号互动理论就更加贴近真实的时尚产业。符号互动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是实用主义。皮尔斯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其符号学成为实用主义的基本逻辑方式，这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到了符号互动论那里。皮尔斯符号学最独特之处就是它的三分法。如果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符号结构相比较，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体就类似于能指，对象类似于所指，解释项就是既外在于再现体与对象，同时又与它们相关联的第三个符号构成因素，三者共同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用皮尔斯自己的话来说，“符号的解释项就是符号所传达的所有事物，也即必须通过间接经验才能获得的，与其对象相熟悉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符号的合适意指结果”。（皮尔斯，2014，p. 44）这即是说，符号对于每个人产生的意义都是不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依赖于符号解释者对它的阐释，这种阐释会因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而解释项在皮尔斯看来又是另一个再现体，即一个新的符号，这便形成了一个无限的回归，一个永恒的意义演绎过程。简而言之，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它关注的不是人们用以表达意义的语言符号系统，而是人们认知世界的逻辑系统。

符号互动理论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之下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都考虑进了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之中。虽然巴尔特在对时尚及其他文化的研究中也关注修辞学层面，即符号的含蓄意指层面，从而将符号学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联系在了一起，但这种结构是在一个静态的意指平面上搭建起来的，不能完全等同于皮尔斯的动态符号学。含蓄意指是一系列能指与所指的平面连接的串联，而皮尔斯的符号论却是一系列动态过程的延展。因此，符号互动理论下的时尚研究更重视时尚意义的连续演绎过程，而不是意义碎片的随意拼

接。这种理论认为,时尚产生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妥协,而不仅是生产者的随意创造。时尚生产者分享了手中的权力,为所有的时尚参与者提供了成为创造者的可能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将结构主义与符号互动论的时尚研究之间的差异大致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对时尚的理解上看,结构主义认为时尚是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符号运作体系,它统筹了整个社会的意义框架。符号互动论则将时尚看作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互动形式,它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从时尚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消解了真实的主体,认为时尚参与者都被被动地陷入了时尚的统辖之中,符号互动论则认为时尚是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结果。结构主义将时尚置于主动地位,符号互动论则将时尚参与者视为能动角色。另外,从时尚的时间模式上看,结构主义认为时尚就是现代性中的循环时间模式,符号互动理论则认为线性时间模式是时尚变化的主线。在符号互动论看来,时尚虽然会回溯历史,但回溯的原因是为了更好地保持历史连续性,从而紧跟现代性的步伐。因此,循环是为了更好地向前发展。

虽然在两种理论的视角下,时尚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但并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判定它们的对错或优劣。结构主义虽然脱离了现实世界,但却整体性地把握住了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意义逻辑体系,揭示了消费社会中符号对人们施加的暴政。虽然这种分析可以被理解为在为消费逻辑的神话争取合法性,但它也为去神话的道路指出了一个可行的方向——只有理解神话的逻辑才能找出去神话的方法。而符号互动论虽然缺乏对时尚的整体性把握,但却将意义层面上的时尚还原为真实世界中的时尚,并为分析具体的时尚现象提供了理论纲领。它不仅具有关注时尚中的每一个特殊个体的能力,也具有分析个体间及群体间的互动关系的能力。可见,两种方法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因而更加全面的时尚研究应该是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一方面,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可以把握时尚意义的整体逻辑,并分析具体时尚符号在静态时刻中的含义。另一方面,用符号互动论的方法可以接触真实的时尚现象,从动态的意义生成视角解读真实时尚的模糊性与复杂性。两种符号理论的结合将能同时从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宏观与微观、意义与真实的综合角度对时尚进行全面的分析。这也是为何在戴维斯的时尚研究中能看见对巴尔特和鲍德里亚的关注,而巴特的时尚分析也会关注含蓄意指的原因。

引用文献:

- 巴尔特 (2008). 符号学原理 (李幼蒸,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巴特 (1999). 神话——大众文化诠释 (许蔷蔷, 许绮玲,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巴特 (2011). 流行体系 (敖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鲍德里亚 (2009).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夏莹,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鲍德里亚 (2014). 消费社会 (刘成富, 全志刚,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波德里亚 (2012). 象征交换与死亡 (车槿山,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布鲁默 (2005). 论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 载于苏国勋, 刘小枫 (主编). 社会理论的诸理论 (pp. 633-696).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哈桑 (2015). 后现代转向: 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 (刘象愚,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卢里 (2000). 解读服装 (李长青, 译).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 皮尔斯 (2014). 论符号 (赵星植,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史文德森 (2010). 时尚的哲学 (李漫,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汤喜燕 (2012). 布鲁默与西美尔的时尚观比较. 装饰, 10, 72-75.
- Barnard, M. (2010). Fashion statements: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Scapp, R. & Seitz, B. (Eds.). *Fashion statements: On style, appearance, and reality* (pp. 23-34).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Blumer, H. (1936). Social attitudes and nonsymbolic interaction.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9(9), 515-523.
- Blumer, H. (1969). Fashion: 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0(3), 275-291.
- Campbell, C. (2007). When the meaning is not a message: A critique of the consumption as communication thesis. In Barnard, M. (Ed.). *Fashion theory: A reader* (pp. 159-169).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avis, F. (1982). On the "Symbolic"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5(1), 111-126.
- Davis, F. (1991). Hebert Blumer and the study of fashion: A reminiscence and a Critiqu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1), 1-21.
- Davis, F. (1992). *Fashion, culture, and identity*. Chicago, IL, London, UK: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Eco, U. (2007). Social life as a sign system. In Barnard, M. (Ed.). *Fashion theory: A reader* (pp. 143-147).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asier, S. B., Nagasawa, R. H., & Hutton, S. S. (1991) Fashion, postmodernity and personal appearance: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formulation. *Symbolic Interaction*, 14(2), 165-185.

□ 符号与传媒 (15)

- Kasier, S. B., Nagasawa, R. H. & Hutton, S.S. (1996). Construction of an SI theory of fashion: Part 3. Context of explanation. *Clothing and textiles research*, 14(1), 54–62.
- Lefebvre, H. (1972).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Rabinovitch S., Trans). New York, NY, Evanston, IL, San Francisco, CA & London, U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Sapir, E. (2007). Fashion. In Barnard, M. (Ed.). *Fashion theory : A reader* (pp. 39–45).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Vannini, P. (2007). Extending and broadening blumer's conceptualization of fashion: Adding notions of generic social process and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Sociological focus*, 40(3), 306–319.
- Wilson, E. (2003).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revised edition). London, UK & New York, NY: I.B. Tauris.

作者简介:

廖茹茵, 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与时尚理论。

Author:

Liao Ruhan, Ph. D. candidate of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west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Western aesthetics and fashion theory

Email:lrh0603@qq.com